

## 江州地帶與南朝詩歌的關係\*

王文進\*\*

### 〔摘要〕

歷來研究六朝文史的學者大都會注意到「荆、揚之爭」對南朝政局的影響。但若進一層探究之：荆、揚雖在大結構上顯著地牽動著南朝政局之安定，實際上夾處其間的「江州地帶」，則更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樞紐作用。由於近年來兩岸學者開始興起以「區域研究」的視角介入南朝文化之剖析，故「江州地帶」的文學研究也逐漸受到重視。然而筆者早在二十年前即以《荆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展開地域文化的試探性討論，並藉由南朝特殊的府官制——「州府雙軌制」與區域性格交錯而成的網脈，探觸其對南朝詩歌發展所形成的微妙結構。

今更擬廣納諸賢佳著的成果，重新全面性地探討身處荆、揚兩地之間江州文學的特殊位階。首先將逐一考察東晉、宋、齊、梁、陳之際江州刺史的府主，與其重要的文人僚佐，藉以勾勒出風雅文士游仕江州的文化活動與現象，及其品題江州山水的美學特質。並再進一步對照荆州、揚州與江州之間文學寫作風格可能出現的差異性。處於荆、揚相爭之文化衝突與政權對抗下，江州文學如何保持其平淡詩風與隱逸特質；而在「州府雙軌制」的權力結構中，如何促使府主及其下文人幕僚有更多親臨江州之機緣，也使得江州文學括含著外籍文人之游仕經歷，與本地文人書寫視角、主題關懷之交錯，更藉由江州之精神象徵——「廬山」，來說明江州地帶於南朝時期所蘊藏的宗教意涵，與士大夫精神圖騰的特徵。

關鍵詞：江州、廬山、揚州、荆州、荆揚之爭、山水、隱逸、州府雙軌制、區域研究

---

\*本文係國科會 NSC96-2411-H-259-013 計劃之研究成果，並感謝兩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的意見，特此致意。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收稿日期：2009年1月22日，審查通過日期：2009年4月15日

責任編輯：黃啟方教授

## 一、前言

在東晉南朝的歷史中，荆、揚兩地的消長實象徵著六朝政治的發展模式。<sup>1</sup>政經中樞的揚州與邊塞重鎮的荊州，不僅牽繫著東晉南朝國勢的安危，<sup>2</sup>也令長江沿岸的國土得獲開發。<sup>3</sup>薛道衡（540—609）即言：「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sup>4</sup>足見長江流域在六朝時代不僅扼地理形勢之要，亦為政治穩定之關鍵。而處於「中流衿帶」<sup>5</sup>與「吳頭楚尾」<sup>6</sup>的「江州」地區，於傳統上「江左以來，揚州根本，委荆以閩外」<sup>7</sup>的戰略布局外，也顯示出其特殊之

<sup>1</sup> 王仲華（1913-1986）便指出：「東晉、南朝的經濟軍事重心，就地區而論，主要是在荆、揚二州，……兩州的戶口，也占了江南的一大半，……然而揚州雖是京畿—政治中樞之所在；而長江上游的荊州又因『甲兵所聚』，它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又常有控制下游的可能，因此，就東晉、南朝整個時期的內部形勢來看，荊州的鎮將又往往因上游軍事經濟的優勢，孕育野心，威逼下游。」見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冊上，頁331。

<sup>2</sup> 《宋書·王敬弘何尚之傳·史臣曰》：「樹根本於揚越，任推轂於荆楚」。參〔南朝梁〕沈約（441-513）：《宋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二十六，頁1739。《資治通鑑·宋紀十·孝建元年》：「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為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參〔宋〕司馬光（1019-1086）撰，〔元〕胡三省（1230-1302）注：《資治通鑑》，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一百二十八，頁4020。又傅樂成（1922-1984）亦針對荊州對六朝政局之穩定性提出重要看法。參氏著：《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頁93-115。

<sup>3</sup> 田餘慶在〈古史分合中的國土開發與民族發育〉中便指出：「十六國北朝，東西對峙還反覆出現，只不過此時期更重要的已是南北對峙，古史中的分合問題已進入一個更高階段了。分和合，在地域上轉變為南北問題，說明早已起步開發的南方地區（其中江東、江漢、西蜀幾處更顯著）在中國發展總進程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如果沒有六朝，沒有南宋，江南的普遍發展也要緩慢得多。」收錄於「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年），頁82-83。

<sup>4</sup> 《隋書·薛道衡傳》。參〔唐〕魏徵（580-643）等撰：《隋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五十七，頁1407。

<sup>5</sup> 《南齊書·州郡志上》。見〔南朝梁〕蕭子顯（489-537?）：《南齊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十四，頁260。

<sup>6</sup> 見〔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卷三十，冊二，頁1300-1302。

<sup>7</sup> 《宋書·何尚之傳》，卷二十六，頁1738。

關鍵性。<sup>8</sup>晉惠帝（290—306）在元康元年（291）設立江州後，<sup>9</sup>使夾處中流的江州成爲兵家必爭之地，<sup>10</sup>如桓沖（328-384）即謂：「尋陽北接強蠻，西連荊郢，亦一任之要。」<sup>11</sup>以爲防備符堅（338-385）入侵而布陣，然事後竟變爲其與謝安（320-385）政治角力之場域。<sup>12</sup>從中可見在荆、揚對峙之下，江州實爲恐怖平衡中的關鍵砝碼：若其歸附於朝廷中樞的揚州，便可有效遏阻上游荆州的虎視眈眈；然若其爲西鎮荊州之禁嚮，則朝廷將處在上游大軍壓境之威脅。<sup>13</sup>

清代顧祖禹（1631-1692）便對江西（即六朝江州地帶）的戰略重要性提出看法：

按江西地當吳、楚、閩、越之交，險阻既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然規其大略，本非無事之國也。是故九江雄據上游，水路形便，足以指領東西，非特保有湖濱而已。南、贛爲南方之藩屏，汀、漳、雄、韶

<sup>8</sup> 如嚴耕望即稱：「荆揚爭衡，得江州者恆勝，此殆終南朝不變之局。」見氏著：《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年），頁46-47。又胡阿祥提出江州治所游移於潯陽、豫章二郡，亦與上下游之爭有關。參氏著：《六朝疆域與政治》（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頁176。

<sup>9</sup> 《晉書·地理志下》：「有司奏，荆、揚二州疆土廣遠，統理尤難，於是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武昌、桂陽、安成，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見〔唐〕房玄齡（578-648）等撰：《晉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十五，頁462-463。

<sup>10</sup> 《晉書·劉毅傳》曰：「（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順逆之衝。」同前注，卷八十五，頁2208。陶侃（259-334）也說：「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同前注，卷八十一，頁2114。

<sup>11</sup> 《晉書·桓彝附桓沖傳》。同前注，卷四十四，頁1951。

<sup>12</sup> 根據《晉書·桓彝附桓沖傳》可知：「沖既憚堅眾，又以疾疫，還鎮上明。表以『夏口江沔衝要，密邇強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輒版督荆江十郡軍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強蠻，西連荊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請以王蒼補江州刺史。』詔從之。時蒼始遭兄劭喪，將葬，辭不欲出。於是衛將軍謝安更以中領軍謝輅代之。沖聞之而怒，上疏以爲輅文武無堪，求自領江州，帝許之。」同前注。可見各方對於江州爭奪之激烈，在六朝史中其地位實不言而喻。

<sup>13</sup> 田氏於〈庾氏之興和庾、王江州之爭〉中說：「江州若合于荊州，上游就更能自主，從而對下游的優勢也會加大，建康將感到威脅。江州若控制在建康朝廷手中，荊州方鎮將難於獨立，有可能受制于建康。」見氏著：《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96。

諸山會焉，連州跨郡，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為淵藪，故設重臣臨之，豈徒扼閩、嶺之襟喉哉，抑且臨南昌之項背矣。九江、南昌皆與湖廣連壤，而袁州逼近長沙，逋民客戶，頗難譏察。自吉安以南，益與彬、桂相比，稱巖險焉。饒州東北與新安相錯，而廣信東通衢、婺，為江、浙之門戶。其南則路入建寧，又江、閩之津梁也。建昌與閩亦為鄰近，而驛騷之患，視廣信為稍殺焉。夫廬阜為之山，彭蠡為之澤，襟江帶湖，控荆引越，形勝有由來矣。<sup>14</sup>

顧氏指出江西地區不僅位當諸路要衝，始終無法置身於歷代方鎮爭奪之外；再加上其地多山林澤藪、土地肥沃、交通便捷，故不僅常為難民棲身之所，亦是綠林盜匪集聚要地。故自來江州即「非無事之國」，以致常須設置重臣戍守；其「襟江帶湖，控荆引越」之形勝，則為各家必爭之地。

由此可見江州實具有以下特質：一、糧草盈備，<sup>15</sup>《隋書·食貨志》即謂為穀糧儲備之地。<sup>16</sup>二、甲兵充足，如《晉書·劉胤傳》便有「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人萬計，布在江州。」<sup>17</sup>的記載，而這些流民受到鎮主收編便成為左右荆、揚二地平衡的重要勢力。<sup>18</sup>三、則是交通發達：如王述即以江州運輸之便勸阻庾冰（296-344）的移陣之議；<sup>19</sup>劉毅更言：「江州在腹心之中，憑接揚、豫」，<sup>20</sup>正可見

<sup>14</sup> 見〔清〕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冊八，卷八十三，頁3889-3890。

<sup>15</sup> 如《晉書·劉胤傳》：「是時朝廷空罄，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見《晉書》，卷八十一，頁2114。

<sup>16</sup> 《隋書·食貨志》曰：「其倉，京都有龍首倉，即石頭津倉也，臺城內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太倉，東宮倉，所貯總不過五十餘萬。在外有豫章倉、釣磯倉、錢塘倉，並是大貯備之處。」見《隋書》，卷二十四，頁674-675。

<sup>17</sup> 同注15。

<sup>18</sup> 《宋書·劉敬宣傳》：「（劉）敬宣既至江州，課集軍糧，搜召舟乘，軍戎要用，常有儲擬。故西征諸軍雖失利退據，因之每即振復。」見《宋書》，卷四十七，頁1412。

<sup>19</sup> 《晉書·王述傳》載其與庾冰牋曰：「……方今強胡陸梁，當稽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又江州當泝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見《晉書》，卷七十五，頁1962。

<sup>20</sup> 《宋書·庾悅傳》。見《宋書》，卷五十二，頁1490。

其所居交通樞紐之地位。據此可知，掌握了江州，即代表握有主導東晉南朝政治的動向，<sup>21</sup>故無論是東晉的庾、王之爭，或桓、謝消長，皆視對江州的控制為實力的指標；<sup>22</sup>也令南朝諸帝不敢隨意處置，縱使江州都督多僅督守本區，<sup>23</sup>卻往往指派宗室子弟就任刺史。<sup>24</sup>足見在南朝的政治環境下，江州牽一髮而動全身之戰略地位，實關係著中央政權與地方集團的角力競賽。<sup>25</sup>

近年來海內外學者雖對「區域研究」之興趣沛然成形，而對於六朝江州的討論卻僅止於政治關係上，<sup>26</sup>或宗教氛圍的特色，<sup>27</sup>即使討論江州文學的發展，也僅著墨於其中隱逸風氣的影響上，<sup>28</sup>雖然討論維度看似多元，卻也對六朝區域文學中重要且特殊的制度性結構毫無關注。事實上，早在二十年前（1987）筆者博士論文：《荆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sup>29</sup>即對此多有著墨，意在探討南朝長江上

<sup>21</sup> 張承宗：〈六朝時期江州的戰略地位〉，《蘇州大學學報》，1993年第1期，頁88-95。

<sup>22</sup>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頁86-112，226-228。

<sup>23</sup>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頁38。

<sup>24</sup> 參章義和：〈論江州〉。見氏著：《地域集團與南朝政治》（上海：華東師範出版社，2002年），頁151-179。

<sup>25</sup> 如宋順帝（477-479）升明元年（477）十一月沈攸之（?-478）起兵叛亂，時任輔政的齊王蕭道成（427-482）與其子蕭蹟（440-493）屯兵盆乘以禦敵：「攸之事起，世祖為西討都督，啟山圖為軍副。世祖留據盆城，眾議以盆城小難固，不如還都。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大眾致力，川岳可為。城隍小事，不足難也。』世祖使城局參軍劉皆、陳淵委山圖以處分事。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世祖甚嘉之。」見《南齊書·周山圖傳》，卷二十九，頁541-542。沈攸之的軍團在久攻郢城不下軍心渙散，且甚至江州盆城即受困停滯不前，令其最終進退失據，連根據地江陵亦不保，而最終兵敗受戮：「攸之攻郢城久不決，眾心離沮。昇明二年正月十九日夜，劉攘兵燒營入降郢城，眾於是離散，不可復制。將曉，攸之斬劉天賜，率大眾過江，至魯山，諸軍因此散走。還向江陵，未百餘里，聞城已為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界，為封人所斬送。」見《宋書·沈攸之傳》，卷七十四，頁1942。

<sup>26</sup> 參胡阿祥：《魏晉本土文學地理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46-152。

<sup>27</sup> 參劉苑如：〈廬山慧遠的兩個面向〉，《漢學研究》第24卷第1期（2006年6月），頁71-106。

<sup>28</sup> 可參曹道衡：《中古文學史論文集續編》（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頁121-136。與李劍峰：《陶淵明及其詩文淵源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68-295。

<sup>29</sup> 參拙著：《荆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7年）。

游之荆、雍地帶，於南朝特殊「州府雙軌制」<sup>30</sup>與區域性格交錯而成的結構下，對南朝詩歌發展所形成的微妙變化。今擬在此基礎上，再廣納近年來諸賢佳作，進而全面性地探討江州地帶與南朝詩歌的關係。闡發江州地帶在東晉南朝特殊時空中，於文學史發展歷程所存在之意義：其一於「州府雙軌制」的體系下考察主佐間的文學活動現象；其二則以江州廬山風勝之求仙遁跡，對照揚州「東山」的仕隱差別；其三則以行旅之悲分析文人由荊州至江州的宦遊之苦，也突顯江州於六朝文人心中，始終象徵著貶謫之宦與離鄉之苦。

## 二、「州府雙軌制」下方鎮主佐的文學活動

兩漢時代州刺史並無屬吏，往往每到一郡，便選擇當地賢才俊秀者任與從事。嚴耕望即指出秦、漢在郡府僚佐的制度上，有中央派任的「佐官」與守相自辟的「屬吏」之別，<sup>31</sup>只不過秦漢的郡府僚佐並不會跟隨府主調動而轉移，如《漢舊儀》即載：

丞相刺史常以秋分行部，御史為駕四封乘傳，到所部郡國，各遣吏一人迎界上，得載別駕，自言受命移郡國，與刺史從事，盡界罷。<sup>32</sup>

由此可知，秦漢時代的地方僚佐並沒有機會隨同府主游仕各方，也令其時文人沒有對各地名山勝水驚嘆賞玩的機緣，而創造出如南朝時代「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sup>33</sup>的山水清音。但進入魏晉南北朝之後，地方首長雖仍沿襲秦漢之制，然在僚佐選任的方式卻已明顯不同，嚴耕望復指出：

<sup>30</sup> 參拙作：〈州府雙軌制對南朝文學的影響—以荊雍地帶為主的觀察〉，收錄於拙著：《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頁131-156。

<sup>31</sup> 參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年），頁102。

<sup>32</sup> 〔漢〕衛宏撰：《漢舊儀》（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三代遺書》本），卷上，頁7。

<sup>33</sup> 見《文心雕龍·物色》。參〔南朝梁〕劉勰（465-520）著，周振甫（1911-2000）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98年），頁846。

自東晉以下逮於梁陳，州刺史多加將軍之號，州之佐吏除別駕治中之一系統外，又有將軍府佐。……而刺史之加將軍者，其佐吏則有州佐、府佐兩系統。<sup>34</sup>

此所謂的州、府兩系統，筆者統稱之：「州府雙軌制」，此實為南朝地方官制中的一項重要特色，即州刺史的僚佐除了備有以別駕、治中、主簿等官職的「州官系統」之外，更兼有如長史、司馬、參軍諸職的「府官系統」，這種地方官制的特性乃是：一、州佐與府佐的任命方式不同；<sup>35</sup>二、使南朝文人仕進機會倍增；<sup>36</sup>三、則為文人從此有了隨府主游仕各大州鎮的仕宦經驗。<sup>37</sup>過去，筆者曾將此理論施於荆、雍地帶的文學發展作為操作模式，發現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州府雙軌制」，實與六朝文學的發展有著密切關係：府主之附庸風雅，不但吸引著文人依附而形成文學集團，也代表著文人增加了出仕及游宦的機緣，因此江州在此機制下，理應也存在府主與僚佐的游仕條件。

以下先整理江州重要的府主與其文人僚佐，表格所參考之文獻有萬斯同（1638-1702）的《晉方鎮年表》、《東晉方鎮年表》、《宋方鎮年表》、《齊方鎮年表》，<sup>38</sup>與吳廷燮（1865-1947）的《晉方鎮年表》、《東晉方鎮年表》、《宋方鎮年表》、《齊方鎮年表》<sup>39</sup>等文獻資料，並配合史書的查核與當代學者之研究，<sup>40</sup>逐一表列出東晉南朝時期（317-589）二百多年間江州的府主與其重要僚佐，以勾勒出風雅文士游仕江州所形成的文化活動與文學現象。

<sup>34</sup>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頁 152。

<sup>35</sup> 嚴耕望曰：「州佐為刺史所自辟用之本州人，（後期，別駕治中由中央任命，然仍限本籍。）輔佐則需經中央任命，否則謂之兼行板授。」同前注，頁 153。

<sup>36</sup> 拙著：《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頁 131-132。

<sup>37</sup> 《宋書·百官志下》：「今有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主簿、西曹書佐、祭酒從事史、議曹從事史、部郡從事史，自主簿以下，置人多少，各隨州，舊無定制也。」見《宋書》，卷四十，頁 1257。

<sup>38</sup> 俱見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冊三，頁 3385-3397、3453-3466、4255-4270、4317-4322。

<sup>39</sup> 同前注，頁 3415-3451、3467-3515。

<sup>40</sup> 章義和：《地域集團與南朝政治》，頁 151-179。

府主	文人	籍貫	歷職江州官稱		史書出處
			州	府	
溫嶠	江彪	陳留圉	別駕	參軍	《晉書》頁 1538
庾亮	孫綽	太原中都		參軍 章安令	《晉書》頁 1544
	范汪	荊州	別駕	參軍	《晉書》頁 1982
	殷浩	陳郡長平		記室參軍 司徒左長史	《晉書》頁 2043
	王羲之	琅邪臨沂		參軍 長史	《晉書》頁 2094
臨川王 劉義慶	何偃	廬江灊	平西府主簿		《宋書》頁 1607
	何長瑜	東海		平西記室參 軍	《宋書》頁 1775
	袁淑	陳郡陽夏		諮議參軍	《宋書》頁 1835
	鮑照	東海		王國侍郎	《鮑照年譜》 <sup>41</sup> 頁 37
廬陵王 劉紹	何長瑜	東海		南中郎行參 軍	《宋書》頁 1775
	謝莊	陳郡陽夏		南中郎諮議 參軍	《宋書》頁 2167
宋孝武帝 劉駿	范廣淵			撫軍諮議參 軍 記室參軍	《宋書》頁 1623
	顏竣	琅邪臨沂		南中郎記室 參軍	《宋書》頁 1959
	顏師伯	琅邪臨沂	主簿	參軍事 署刑獄	《宋書》頁 1992

<sup>41</sup> 參丁福林：《鮑照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37。



	袁粲	陳郡陽夏	南中郎主簿	安北、鎮軍、北中郎行參軍 記室參軍	《宋書》頁 2229
安成王 蕭曷	袁象	陳郡陽夏	主簿	征虜參軍	《南齊書》頁 833
武陵王 蕭曄	陸雲公	吳郡		參軍	《梁書》頁 724
	何思澄	東海郟		錄事參軍	《梁書》頁 713
安成王 蕭秀	何遜	東海郟		參軍	《梁書》頁 693
	何思澄	東海郟		左常侍 記室參軍	《梁書》頁 713
建安王 蕭偉	何遜	東海郟		水曹行參軍 記室	《梁書》頁 693
武陵王 蕭紀	江革	濟陽考城		南中郎長史 明威將軍、 尋陽太守	《梁書》頁 525
	劉孝先	彭城	主簿	法曹	《梁書》頁 595
豫章王 蕭綜	王筠	琅琊臨沂		長史	《梁書》頁 486
	褚翔	河南陽翟		長史	《梁書》頁 586
晉安王 蕭綱	陸倕	吳郡吳人		長史 尋陽太守	《梁書》頁 403
	張率	吳郡吳人		諮議參軍 記室	《梁書》頁 478
	江革	濟陽考城		長史 尋陽太守	《梁書》頁 523
	劉霽	平原		參軍 內記室 補西昌相	《梁書》頁 657

	庾肩吾	新野		王國中郎 雲麾參軍 記室參軍	《梁書》頁 690
廬陵王 蕭續	蕭子雲	蘭陵		諮議參軍	《梁書》頁 514
	江革	濟陽考城		長史	《梁書》頁 523
	蕭幾	蘭陵		文學	《梁書》頁 597
	何遜	東海郟		記室參軍	《梁書》頁 693
湘東王 蕭繹	張暉	吳郡		長史 尋陽太守	《梁書》頁 609
	王僧辯	太原祁		雲騎將軍司 馬 新蔡太守	《梁書》頁 623
	劉綏	平原高唐		記室參軍	《梁書》頁 692
	何思澄	東海郟		錄事參軍	《梁書》頁 714
	陰鏗	武威		中錄事參軍	《陳書》頁 472

由以上內容觀察，雖本籍江州之州官系統留存資料較少，然從陶淵明（365-427）與丁柴桑、龐參軍、郭主簿、龐主簿、鄧治中、羊長史、張常侍、胡西曹、顧賊曹等人的詩文唱和，也略可看出在州官系統下江州士人的文學活動。雖然與陶唱和者多為下層官僚，<sup>42</sup>但這些作品卻也證明「州府雙軌制」提供了文人表演文學的空間。而在府官系統中，有更多本是隨從府主來到江州就任之文人，則「州府雙軌制」不僅象徵著六朝文人重要的仕宦歷程，更促使六朝文學在文人游宦的流動之中，產生特殊的文化美學：<sup>43</sup>其一是文人彼此唱和宴樂之公讌聚會，其次則為四

<sup>42</sup> 李劍峰認為藉由陶淵明與基層官僚的贈答唱和中，可嗅出江州地帶的寒門文人於門閥制度下所受的不公對待。參《陶淵明及其詩文淵源研究》，頁 283-285。

<sup>43</sup> 如鄭毓瑜即曾指出魏晉以後的行旅文學：「常常游移在出處進退之間，也就是既具有政治性聯想，卻又充滿胸中丘壑的閒情雅趣。」見氏著：《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頁 118。

處流轉的飛蓬之悲。前者如謝瞻〈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爲豫章太守庾被徵還東詩〉：

祇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方舟析舊知，對筵曠明牧。舉觴矜飲餞，指途念出宿。來晨無定端，別晷有成速。頽陽照通津，夕陰曖平陸。榜人理行艫，輜軒命歸僕。分手東城闥，發櫂西江隩。離會雖相雜，逝川豈往復。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sup>44</sup>

遼欽立注云：「集曰：謝還豫章，庾被徵還都，王撫軍送至湓口南樓作。」<sup>45</sup>考謝瞻於永初二年（421）卒於豫章太守任內，<sup>46</sup>故此詩應作於江州。詩中表露出同僚臨別時之依依不捨，顯示南朝文人在受「州府雙軌制」的職務調動中，仍藉贈答唱和之文學活動來表露情志。故東晉時袁宏（328-376）的臨行宴別，亦具有相同意義。<sup>47</sup>後者則有如謝靈運（385-433）的〈入彭蠡湖口詩〉：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屢崩奔。乘月聽哀狖，浥露馥芳蓀。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靈物各珍怪，異人祕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輟流溫。徒作千里曲，絃絕念彌敦。<sup>48</sup>

顧紹柏繫此詩作於元嘉九年謫赴臨川途中，<sup>49</sup>彭蠡湖即今鄱陽湖，可知靈運亦途經江州，故詩中所述之美景反而透露作者行旅之悲，也體現出六朝文人在「州府雙軌制」下，除與府主僚佐驚嘆「悄焉動容，視通萬里」之異地山水的感應之外，<sup>50</sup>

<sup>44</sup> 見遼欽立（1911-1973）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1133。

<sup>45</sup> 同前注。

<sup>46</sup> 《宋書》，卷五十六，頁1558。

<sup>47</sup> 《世說新語·言語篇》：「袁彥伯為謝安南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惻，歎曰：『江山遠落，居然有萬里之勢。』」見〔南朝宋〕劉義慶（403-444）著，〔南朝梁〕劉孝標（462-521）注，余嘉錫（1884-1955）箋疏，周祖謨（1914-1995）、余淑宜整理：《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93年），頁140。

<sup>48</sup> 見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頁281。

<sup>49</sup> 同前注。

<sup>50</sup> 引文見《文心雕龍注釋·神思》，頁515。又鄭毓瑜對於六朝文學藝術中「情」、「物」、「辭」

也刻劃出六朝文人面臨行旅宦游時的沮喪與恐懼。

因此，如孫綽（314-371）的〈與庾冰詩〉之十即提到：

蕪湖之寓，家子之館。武昌之遊，繼繼夕旦。邂逅不已，同集海畔。宅仁懷舊，用忘僑歎。<sup>51</sup>

據《晉書·孫綽傳》：「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補章安令，征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sup>52</sup>可知孫綽為庾亮（289-340）領江、荆、豫三州時的幕府之客。<sup>53</sup>是故，「蕪湖之寓」指的即是豫州府鎮，<sup>54</sup>而「武昌之遊」係咸和九年（334），庾亮遷任荊州時的駐所。若酌以孫綽的「懷舊」口吻，可知此詩或晚於咸和九年。詩中敘及孫、庾二人所參與的文宴之樂，正是在庾亮府中屢見不鮮的沙龍聚會，如《世說新語·賞譽》言：

孫興公為庾公參軍，共游白石山。衛君長在坐，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孫遂沐浴此言。<sup>55</sup>

白石山在廬江郡，<sup>56</sup>此次遊會還有「旄仗下行」<sup>57</sup>的衛永在座，孫綽本欲揶揄其貌，庾亮卻慧眼視傑，認為衛永亦有令人的傾倒之處，除顯露出其鑑別人材之功外，也可知其主佐之間，平日暇時之所論。而曾自托玄遠的孫綽聽後竟沐浴其中，<sup>58</sup>雖

---

三者間的「應感之會」則頗有見地。參氏著：《六朝情境美學綜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年），頁21-29。

<sup>51</sup>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頁898。

<sup>52</sup> 《晉書·孫綽傳》，卷五十六，頁1544。

<sup>53</sup> 《晉書·庾亮傳》：「陶侃薨，遷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荆、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假節。亮固讓開府，乃遷鎮武昌。」同前注，卷七十三，頁1921。

<sup>54</sup> 事實上，晉成帝咸和四年(329)，蘇峻亂後，庾亮即出任豫州刺史。同前注。

<sup>55</sup> 《世說新語箋疏》，頁478。

<sup>56</sup> 《隋書》，卷三十一，頁875。

<sup>57</sup> 《世說新語箋疏》，頁616。

<sup>58</sup> 《世說新語·品藻篇》：「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

嫌過於誇飾，但也將庾亮清談之力活靈於目。此外還如《世說新語·容止》所記：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道，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讌，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積。」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sup>59</sup>

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引孫綽〈庾亮碑〉文道：「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sup>60</sup>孫綽作為庾亮幕僚，其語最能代表庾亮集團對其府主的看法。而庾亮出鎮荊州，雖曾一度為北伐中原而與廷臣有爭，然其外有「風格峻整，動由禮節」<sup>61</sup>之譽，內則身為國之懿親而忠於晉室，故終其世，荆、揚之間的情勢相當安穩。而其府中僚佐亦多為玄談中人，再加上長期的安定與府主的修養，也使得京城建康所流行的玄言詩風亦蔓延至三千里外的荊州。

由以上資料實可理解，在「州府雙軌制」的結構下，主佐之間的文學活動不但是一種常態且頻繁的現象，實際上也會造成文學風氣的傳播與新變。如謝朓（464-499）在好辭賦的蕭子隆荊州府中：「流連晤對，不捨日夕」，<sup>62</sup>遭到王秀之所讒以致被赦回都，故而為詩曰：「常恐鷹隼擊，秋菊委嚴霜。寄言罽羅者，遼闊已高翔。」<sup>63</sup>方東樹（1772-1851）云：「此在荊州隨王府被讒赦回，與康樂被讒出

何如？」曰：『溫潤恬和。』『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同前注，頁 521。

<sup>59</sup> 同前注，頁 618。

<sup>60</sup> 同前注。

<sup>61</sup> 《晉書·庾亮傳》，卷七十三，頁 1915。

<sup>62</sup> 《南齊書·謝朓傳》，卷四十七，頁 825。

<sup>63</sup> 謝朓：〈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見曹融南校注集說：《謝宣城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 205。

為永嘉臨川內史，情事略同。」<sup>64</sup>頗得其情志所指。然謝朓擺脫不掉的其實是「荊州」的歷史包袱，荆、揚對峙的局面仍承宋末以來之局，<sup>65</sup>故用「常恐鷹隼擊」來喻荊州之厄，直到建武二年（495）出為宣城太守時，才以「翳塵自茲隔，賞心過於此」<sup>66</sup>表露起死回生、如釋重負之感。由此也可見，謝朓在隨府主出鎮的同時，仍無法避免來自中央朝廷的監控與威脅，是以其文學創作可以跳脫出南朝專寫宮廷遊宴的囿圍，轉而有自抒懷抱的特質。故「州府雙軌制」在文學研究上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府僚佐的身份既然無籍貫的限制，則天下俊才均可經此中央的管道，隨府主至各地州鎮，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開拓其視野胸襟；相對地，也必然提昇或新變各州鎮地方之文風。

### 三、「廬山」、「東山」書寫下的江、揚差異

而關於江州的文學特色，經前賢學者的研究整理，可以發現多為山林隱逸之內容，曹道衡即指出江州文學的隱逸特色及山林主題與揚州建康的廟堂文學大異其趣，<sup>67</sup>主要原因在於自東晉中期開始江州居住著不少隱士，<sup>68</sup>其中又以湛方生與陶淵明留下較多的作品：前者被認為開謝靈運山水詩及陶淵明田園詩的先河，<sup>69</sup>並使山水的審美思維進入「道體」與「歸返」的雙重觀照；<sup>70</sup>後者不但深受江州地區隱逸文化的影響，<sup>71</sup>且在受到蕭梁安成王蕭秀的標舉後更成為南朝隱逸行為之典

<sup>64</sup> [清]方東樹著，汪紹楹校點：《昭昧詹言》（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頁191。

<sup>65</sup> 參氏著：《荊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頁91-94。

<sup>66</sup> 謝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詩〉，同注63，頁219。

<sup>67</sup> 曹道衡：《南朝文學與北朝文學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55。

<sup>68</sup> 曹道衡：《中古文學史論文集續編》，頁125。

<sup>69</sup> 徐公持：《魏晉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頁554。

<sup>70</sup> 錢志熙認為東晉對「自然」的觀念具有雙重涵攝：「『自然』側重於指從自然界抽繹出來的『無名』之『道』，直到西晉還是如此。而東晉人所說的自然，已類似西方近代所說的返回自然。當然這自然不僅是指具體的自然界，也同時指自然的觀念和人格的理想。」見氏著：《魏晉詩歌藝術原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303。

<sup>71</sup> 李劍峰指出：「晉宋時期，隱士涉足文學和學術活動已經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實際上，晉宋隱逸之風和廬山隱逸的文化氛圍所給予陶淵明的影響是全方位的。」見《陶淵明及其詩文淵源研究》，頁274-276。

範。<sup>72</sup>因此，江州的廬山便不只是宗教的聖地象徵，<sup>73</sup>或僧俗論佛的主要場所，<sup>74</sup>亦成爲文人追慕隱逸的重要意象。<sup>75</sup>

是以在「州府雙軌制」的官僚結構下，隨從出鎮的文士行經廬山時也不免留下描述仙山靈水之作，如頗得劉義慶「甚見知賞」的鮑照，<sup>76</sup>在元嘉十六年（439）秋隨其赴任江州，<sup>77</sup>其〈登廬山詩〉：

懸裝亂水區，薄旅次山楹。千巖盛阻積，萬壑勢迴縈。巖嶠高昔貌，紛亂襲前名。洞澗窺地脈，聳樹隱天經。松磴上迷密，雲竇下縱橫。陰冰實夏結，炎樹信冬榮。嘈噴晨鷗思，叫嘯夜猿清。深崖伏化跡，穹岫闕長靈。

<sup>72</sup> 《梁書·蕭秀傳》：「及至（江）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為里司。秀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即日辟為西曹。」見〔隋〕姚察（533-606），〔唐〕姚思廉（557-637）、魏徵合撰：《梁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二十二，頁343。又可參曹道衡：《蘭陵蕭氏與南朝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115。

<sup>73</sup> 劉苑如認為：「廬山之所以能夠成為眾所矚目的佛門勝景，固然與其千變百化的奇山異水、幽深奇迷的自然景觀不無關係，而更關鍵性的轉變，則是緣於人為的『社會建構』與『文化建構』。慧遠賦予廬山的文化印記、宗教印記，乃是經由一位聖門高僧的慧眼所作的選擇、棲息，並結合了文化上的結社、法集、遊覽和歌詠等活動，大為豐富廬山的文化屬性與空間記憶；……透過慧遠與廬山諸賢所留下的……『風流』遺跡，山至此乃因人而『名』，因人而『高』，甚至因人而『聖』，……這種名山的聖跡化，使得『廬山慧遠』成為名山勝景的標記，從此奠定其在佛教文化上的地位。」見〈廬山慧遠的兩個面向〉，頁77-78。

<sup>74</sup> 最為著名者應該屬隆安三年（398）前後桓玄與慧遠法師有關「形神」與「敬王者」等議題的爭論，可參蔡日新有詳盡之整理。見氏著：《陶淵明》（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0年），頁79-92。

<sup>75</sup> 根據徐效鋼的研究可知東晉南朝時期已累積許多廬山的相關文獻，其中陶淵明「追求自給自足以及逍遙之趣、無言之美、樸素之祕，在廬山得到了最高體悟。」見氏著：《廬山典籍史》（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1年），頁9。

<sup>76</sup> 見《南史·劉義慶傳》。參〔唐〕李延壽撰：《南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十三，頁360。

<sup>77</sup> 《宋書·劉義慶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衛軍諮議參軍；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為辭章之美，引為佐史國臣。」見《宋書》，卷五十一，頁1477。

乘此樂山性，重以遠遊情。方躋羽人途，永與煙霧并。<sup>78</sup>

錢仲聯繫之於鮑照初到江州時，從首二句可見其路途的艱辛，三、四句則寫其登廬山之辛苦，以下均寫廬山奇特地貌及周圍如夢似幻般的仙境，末四句則言登山之樂與成仙之願。雖然鮑照的文學風格本就具備「善製形狀寫物之詞」<sup>79</sup>之質，但上詩除了表現其「傾炫心魂」的特色外，<sup>80</sup>亦不能忽略受到異鄉異物的衝擊。陳祚明謂此詩：「寫景自覺森然」，<sup>81</sup>過度認為這些景色皆是鮑照自然流露的感動，反不如方東樹單純由鮑照詩法所論：「『千巖』以下十四句皆實寫。……雖造句奇警，非尋常凡手所能問津，但一片板實，無款竅章法，……此不必定見為廬山詩，又不必定見為鮑照所作也。換一人、換一山皆可施用。」<sup>82</sup>較貼近六朝文士隨府流轉時面對異地山水的書寫心態。故其〈登廬山望石門〉所述：

訪世失隱淪，從山異靈士。明發振雲冠，升嶠遠棲趾。高岑隔半天，長崖斷千里。氛霧承星辰，潭壑洞江汜。嶄絕類虎牙，巒岿象熊耳。埋冰或百年，韜樹必千祀。鷄鳴清澗中，猿嘯白雲裏。瑤波逐穴開，霞石觸峰起。迴互非一形，參差悉相似。傾聽鳳管賓，緬望釣龍子。松桂盈膝前，如何穢城市？<sup>83</sup>

據晉廬山諸道人所作〈遊石門詩序〉：「乃其將登，則翔禽拂翮，鳴猿厲響。歸雲迴駕，想羽人之來儀；哀生相和，若玄音之有寄。雖髣髴猶聞，而神以之暢，雖

<sup>78</sup> 錢仲聯（1908-2003）增補集說校：《鮑參軍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262。

<sup>79</sup> 鍾嶸（480-552）《詩品·中品》謂：「其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諷詭，含茂先之靡曼，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蕤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見王叔岷（1914-2008）撰：《鍾嶸詩品箋證稿》（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年），頁282。

<sup>80</sup> 《南齊書·文學傳論》言鮑照之創作特色：「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見《南齊書》，卷五十一，頁908。

<sup>81</sup>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影印臺北故宮藏本，卷十八，頁22。

<sup>82</sup> 《昭昧詹言》，頁170。

<sup>83</sup> 《鮑參軍集注》，頁265。



樂不期歡，而欣以永日，當其冲豫自得，信有味焉。」<sup>84</sup>可知登廬山的行為已與「隱淪」、「棲止」複合為一，錢仲聯謂「高岑」以下，皆是描寫望石門之景<sup>85</sup>，鮑照藉由日出光線的變化，逐步描繪其於廬山頂所見雲開霧散之景象，由近而遠地望至石門，卻在詩末吐露即使墮入污穢的凡塵，卻依舊保有如松桂之清高。雖未必如方東樹：「言廬山甚近，何城市之人，甘穢濁而不至此，以與仙人游乎？」<sup>86</sup>之詰問，然則卻顯而易見鮑照藉登高以自抒懷抱之情懷。又如〈從登香爐峰〉：

辭宗盛荆夢，登歌美鳧繹。徒收杞梓鏡，曾非羽人宅。羅景藹雲烏，沾光扈龍策。御風親列涂，乘山窮禹跡。含嘯對霧岑，延蘿倚峰壁。青冥搖煙樹，穹跨負天石。霜崖減土膏，金澗測泉脈。旋淵抱星漢，乳竇通海碧。谷館駕鴻人，巖棲咀丹客。殊物藏珍怪，奇心隱仙籍。高世伏音華，綿古遁精魄。蕭瑟生哀聽，參差遠驚覲。慙無獻賦才，洗汙奉毫帛。<sup>87</sup>

據劉昭注補司馬彪《後漢書·郡國志四·廬江郡》引釋慧遠《廬山記略》云：「東南有香爐山，其上氛氳若香煙。」<sup>88</sup>則鮑照將之擬為仙境祕土亦有其淵源，雖然黃節（1873-1935）以為：「辭宗，謂當時文學之士，視屈宋為盛。歌頌義慶，比之魯侯。其時義慶以江州刺史都督南兗州、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一若魯侯之保有鳧、繹也。」<sup>89</sup>而視此作有歌功頌德之意，然觀當時義慶所督之鎮俱為「僑州」，毫無掌握實際軍事權，<sup>90</sup>又其「世路艱難，不復跨馬」以圖自保，<sup>91</sup>是則黃氏雖指出明遠頌之如魯僖公，<sup>92</sup>然深究詩義未嘗沒有如方東樹所言：「起句蓋用宋玉

<sup>84</sup>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頁 1085。

<sup>85</sup> 《鮑參軍集注》，頁 266。

<sup>86</sup> 《昭昧詹言》，頁 171。

<sup>87</sup> 《鮑參軍集注》，頁 267。

<sup>88</sup> 見〔晉〕司馬彪（?-306）撰，〔南朝梁〕劉昭注：《後漢書·郡國志四》，卷二十二。參〔南朝宋〕范曄（398-445）撰，〔唐〕李賢（651-684）等注：《後漢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 3487。

<sup>89</sup> 《鮑參軍集注》，頁 267-268。

<sup>90</sup> 傅樂成：《漢唐史論集》，頁 102。

<sup>91</sup>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 252-254。

<sup>92</sup> 原詩見《詩·魯頌·閟宮》：「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見屈萬里（1907-1979）撰：《詩經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頁 609-614。

高唐事為切題。」<sup>93</sup>藉宋玉以自比，而抒懷才不遇之歎。

由鮑照諸作觀之，「廬山」始終與「棲隱」或「仙昇」等意象連結，可見廬山地區早已建構出「嶺奇故神明鱗萃，路絕故人迹自分。嚴清升山於玄崖，世高垂化於邗亭。應真陵雲以踞峯，縵忽翳景而入冥。」<sup>94</sup>證明廬山隱逸高人成仙傳說之富，而慧遠於《廬山記略》更曰：「山在江州潯陽南，南濱宮亭，北對九江，九江之南為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里餘。……有匡續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際，遯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受道於僊人，而適游其巖，遂託室巖岫，即巖成館，故時人感其所止，為神僊之廬而名焉。」<sup>95</sup>可說樹立了廬山隱逸空間的仙境典範。是以江淹（444-505）隨建平王劉景素出鎮荊州途經廬山所作〈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峰詩〉，亦點出其「修道成仙」的主旨：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此山具鸞鶴，往來盡仙靈。瑤草正翕純，玉樹信蔥青。絳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中坐瞰蜿蜒，俛伏視流星。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方學松柏隱，羞逐市井名。幸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旌。<sup>96</sup>

然末八句卻頗有愁怨之緒，曹道衡認為江淹詩作中的愁恨，往往與其不受劉景素重用有關，<sup>97</sup>對照此詩所作時間，則其情緒亦因此而發。可見，當文士受「州府雙軌制」之官僚結構而隨府主四處流轉時，若途經江州或待登廬山，往往在其詩作中流露出欣羨棲遁，與渴望成仙之意念，即使如謝莊（421-466）的〈遊豫章西觀洪崖井詩〉：

幽願平生積，野好歲月彌。捨簪神區外，整褐靈鄉垂。林遠炎天隔，山深

<sup>93</sup> 《昭昧詹言》，頁 171。

<sup>94</sup> 〔晉〕支曇諦：《廬山賦》。見〔清〕嚴可均（1762-1843）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晉》（縮印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卷一百六十五，頁 16。

<sup>95</sup> 〔晉〕慧遠：《廬山記》。同前注，卷一百六十二，頁 6。

<sup>96</sup> 江淹：〈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峰詩〉。見〔明〕胡之驥註，李長路、趙威點校：《江文通集彙註》（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103。

<sup>97</sup> 參曹道衡：〈論江淹詩歌的幾個問題〉。收錄於氏著：《中古文學史論文集》（臺北：洪葉出版社，1996 年），頁 380-386。

白日虧。游陰騰鵠嶺，飛清起鳳池。隱曖松霞被，容與澗煙移。將遂丘中性，結駕終在斯。<sup>98</sup>

雖以觀賞遊覽之立場命題，卻仍不脫「洪崖井」仙境傳統下的文學意象，<sup>99</sup>使得詩中的修辭策略與典故指涉皆為游仙而設。由謝莊之經歷可知，其曾任廬陵王劉紹南中郎諮議參軍，可能曾隨其移任江州，此詩雖無從辨識是否為侍從劉紹出遊，但顯然謝莊頗有捨俗棲遁之願，欲藉豫章之仙氛得靈鄉之終遂。可見，當文士來到江州，往往受其巖穴窟泉與世隔絕之形勢，與仙境傳說之薰陶，再加上宗教象徵之影響，而產生肥遯鳴高與得道成仙的想望，這便與揚州「東山」之志的仕隱傳統有所差異。

《世說新語·排調篇》：「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sup>100</sup>劉孝標注《雅量篇》引劉宋何法盛《中興書》曰：「安先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也。」<sup>101</sup>無論謝安（320-385）高臥東山是一種姿態，<sup>102</sup>或欲圖家榮，<sup>103</sup>還是調和儒道，<sup>104</sup>謝安最終的出仕使得「東山」從此成為朝隱的象徵，而建康文人彼此唱和的慕隱之意，也就成為謝安和與其周旋的文士們「養名」的重要手段：<sup>105</sup>

余與仁友，不塗不筍，默匪巖穴，語無滯事。櫟不辭社，周不駭吏，紛動

<sup>98</sup>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宋》，頁 1252。

<sup>99</sup> 如〔晉〕張僧鑑《潯陽記》載曰：「洪井有鸞岡。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岡西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過處。」〔南朝宋〕雷次宗（386-448）《豫章記》亦曰：「洪井西鸞崗、鶴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鶴憩於此。」俱見劉緯毅輯：《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頁 109、246。

<sup>100</sup> 《世說新語箋疏》，頁 801。

<sup>101</sup> 同前注，頁 369。

<sup>102</sup>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頁 171。

<sup>103</sup> 朱大渭：《六朝史論》（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 532。

<sup>104</sup> 陳明：《中古士族現象研究——儒學的歷史文化功能初探》（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頁 201-204。

<sup>105</sup> 王永平：〈論謝安之家教〉，《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1 卷第 2 期（2008年 4 月），頁 1-11。

翫翫，領之在識。會感者圓，妙得者意，我鑒其同，物睹其異。<sup>106</sup>

疇昔宴遊，繾綣髻鬢，或方童顏，或始角巾。褰褐攬帔，濯素□吝，壑無深流，丘無翫仞。今也華髮，卑高殊韻。行跡外乖，理暢內潤。<sup>107</sup>

從謝安與王胡之的彼此贈答可知，「東山」其實是另一種貴遊文學活動之場域，江淹即有〈劉僕射東山集詩〉：「蕭蕭雲色滋，惟愛起長思。喬木嘯山曲，征鳥怨水湄。共惜玉樽暮，願使光陰遲。紳裳視絕雲，銜意方此時。誦飾江臯駕，終從海濱詩。」<sup>108</sup>此詩雖無法查考其確切紀年，然從詩人聚集東山宴別，而嘆息光陰之逝則有珍惜往日宴遊之樂的含意，可見全詩僅有宦遊傷別之感，而無隱逸棲遁之意。故「東山」在建康文人的心中，不但是讌樂之所，更為養名之處，故孫綽謂「遂從雅好，高躋九霄」、「仰詠道誨，俯膺俗教」，<sup>109</sup>雖為刻劃謝安玄儒雙修的棲遁高志，但從郝隆「小草」之喻已可窺見，<sup>110</sup>「東山」在南朝文人心中的價值判斷，已非棲逸之高志，<sup>111</sup>與江州廬山絕俗離塵的仙話傳統，揚州東山則是文人博取功名利祿之踏板，也勢必造成二地相異的文學風格。

<sup>106</sup> 謝安：〈與王胡之詩六章〉之四。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頁905。

<sup>107</sup> 王胡之：〈答謝安詩八章〉之六。同前注，頁886。

<sup>108</sup> 《江文通集彙註》，頁109。

<sup>109</sup> 孫綽：〈贈謝安詩〉。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頁900。

<sup>110</sup> 《世說新語·排調篇》：「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見《世說新語箋疏》，頁803-804。

<sup>111</sup> 如謝靈運〈述祖德詩二首〉之二：「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隨山疏濬潭，傍巖藝粉梓。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又如〈酬從弟惠連詩五章〉之三：「分離別西川，迴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傾想遲嘉音，果枉濟江篇。辛勤風波事，款曲洲渚言。」俱見《謝靈運集校注》，頁154、250。又如劉孝綽（481-539）：〈三日侍安成王曲水宴詩〉：「東山富遊士，北土無遺彥。……餘辰屬上巳，清祓迫前諺。持此陽瀨遊，復展城隅宴。芳洲千里。遠近風光扇。方歡厚德重。誰言薄遊倦。」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頁1826-1827。

#### 四、行旅失落下的荊、江差異

沈約《宋書·劉義慶傳》曰：

（義慶）在京尹九年，出為使持節、都督荊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荊州居上流之重，地廣兵強，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諸子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sup>112</sup>

這不但象徵著荊州在南朝政局的地位，也意味著荊州官吏員額之龐大，而從「分陝」<sup>113</sup>的比喻也顯示出荊州在固守西疆門戶之下，除軍容盛大外，實還具有半獨立的情勢。<sup>114</sup>若與荊州相比，江州顯然在經濟與軍事實力上差距甚大，雖然同樣處在無法忽略之戰線，<sup>115</sup>然南朝文士們對待荊州有如陪都，相對地江州的重要性便大打折扣。而歷任荊州牧似也刻意經營與百姓間頗有深厚感情，如庾翼：「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能。」<sup>116</sup>劉義慶：「在州八年，為西土所安。」<sup>117</sup>蕭憺（479-522）：「（天監）六年，州大水，江溢堤壞，憺親率府將吏，冒雨賦丈尺築治之。雨甚水壯，眾皆恐，或請憺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刑白馬祭江神。俄而水退堤立。」<sup>118</sup>而東晉桓氏家族更是「世在陝西」，<sup>119</sup>使得荊州牧宰的治理往往形同君王之治天下。其中又以梁元帝蕭繹（508-554）與荊州的關係最為密切。其於普通七年（526）十九

<sup>112</sup> 《宋書》，卷五十一，頁 1476。

<sup>113</sup> 《南齊書·州郡志》：「江左大鎮，莫過荊、揚。弘農郡陝縣，周世二伯總諸侯，周公陝東，召公陝西，故稱荊州為陝西也。」見《南齊書》，卷十五，頁 274。周一良也謂：「東晉南朝偏安江左一隅，沿江多為要地。上游之荊州與下游之揚州尤為重鎮。其時仿古名稱，號荊州為陝西，刺荊州曰分陝。」見《魏晉南北朝史札記》，頁 116。

<sup>114</sup> 傅樂成：《漢唐史論集》，頁 93-115。

<sup>115</sup> 毛漢光言：「五朝所有的領土，其精華之區，在於長江流域，即上游的益州、中游的荊州及江州，下游的揚州。其形勢如帶，胡騎南下，頗有顧此失彼之感。」參氏著：《中國中古政治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 年），頁 282。

<sup>116</sup> 《晉書》，卷七十三，頁 1932。

<sup>117</sup> 《宋書》，卷五十一，頁 1477。

<sup>118</sup> 《梁書》，卷二十二，頁 354。

<sup>119</sup> 《晉書》，卷七十四，頁 1954。

歲時出鎮荊州，至大同五年（539）始被徵入爲安右將軍，鎮荊州已達十四年。次年再出爲江州刺史，八年後於太清元年（547）復爲荊州，至承聖元年（552）即帝位爲止，計其出任荊州前後達二十年之久。<sup>120</sup>故在其《玄覽賦》中道出對荊州的懷念：

豈連鏢於分陝，羨追蹤於二公。彼琅臺之作守，有彭泗之嘉名。殊並海之分地，異魚石之所城。經沈子之高墉，蓋水運之堤封。謝禮樂之干櫓，閱武騎之韜衝。飾錦車而前驚，驅魚軒而繼蹤。無復鸞歌鳳舞，唯對綠柳青松。<sup>121</sup>

于浴賢認爲此賦應作於蕭繹任江州刺史前，對自己之前的經歷作一回顧，<sup>122</sup>而從上文提到荊州的部分，可知蕭繹一方面欲追周、召二公之德以任分陝之重，另一方面也無法避免離開京城所形成的行旅悲嘆。

如〈赴荊州泊三江口詩〉：

涉江望行旅，金鉦間綵旂。水際含天色，虹光入浪浮。柳條恆拂岸，花氣盡薰舟。叢林多故社，單戍有危樓。疊鼓隨朱鷺，長簫應紫驄。蓮舟夾羽斃，畫舸覆緹油。榜歌殊未息，於此泛安流。<sup>123</sup>

此詩作於普通七年出鎮荊州之時，首句就透露出對「行旅」之嘆，故無論對江岸風景的瀏覽，或身處雕砌畫舫之中，都顯示出離京的失落感。不過到了〈別荊州吏民〉則已任荊牧十四年之久，則離開荊州反造成蕭繹心靈上的不捨與懷念：「玉節居分陝，金貂總上流。麾軍時舉扇，作賦且登樓。年光徧原隰，春色滿汀洲。日華三翼舸，風轉七星旂。向解青絲纜，將移丹桂舟。」<sup>124</sup>前四句足見「分陝」

<sup>120</sup> 《梁書》，卷五，頁 113-131。

<sup>121</sup>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梁》，卷十五，頁 2。

<sup>122</sup> 于浴賢：〈六朝紀行賦繁榮之鳥瞰〉，收錄於南京大學中文系主編：《辭賦文學論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 年），頁 396。

<sup>123</sup>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頁 2036-2037。

<sup>124</sup> 同前注，頁 2040。

之權位在南朝之重，然軍國政餘，仍不忘吟詠風雅，<sup>125</sup>而蕭繹本身的文學主張，<sup>126</sup>實也影響著其下文士僚佐的創作活動。<sup>127</sup>而未二句藉青絲代擬情感的纏綿，亦見蕭繹對荊州之依依難捨。是以當蕭繹出鎮江州時，便立即為懷念荊州而作〈登江州百花亭懷荆楚詩〉：

極目纔千里，何由望楚津。落花灑行路，垂楊拂砌塵。柳絮飄晴雪，荷珠漾水銀。試酌新春酒，遙勸陽臺人。<sup>128</sup>

「極目纔千里，何由望楚津」不論是用意、用詞均為上乘之作，既顯示出蕭繹在這個階段詩學造詣的純熟，亦流露出十四年來與荆土血脈相連之情。而時任法曹行參軍的陰鏗則有和詩曰：<sup>129</sup>

江陵一柱觀，潯陽千里潮。風煙望似接，川路恨成遙。落花輕未下，飛絲斷易飄。藤長還依格，荷生不避橋。陽臺可憶處，唯有暮將朝。<sup>130</sup>

據《陳書·陰鏗傳》云：「釋褐梁湘東王法曹參軍」，<sup>131</sup>而由此和詩可知陰鏗應曾

<sup>125</sup> 胡大雷：《中古文學集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169-174。

<sup>126</sup> 《金樓子·立言》：「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情靈搖蕩。」見蕭繹：《金樓子》，四部刊要本（臺北：世界書局，1975年），卷四，頁28-29。

<sup>127</sup> 從蕭綱（501-531）〈與湘東王書〉：「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見《梁書》，卷四十九，頁691。從中可知蕭繹的文學才華，而其「情靈搖蕩」的重情文學觀，亦為其下文士的創作主題，如《北史·王褒傳》：「曾作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為悽切之辭，至此方驗焉。」見〔唐〕李延壽撰：《北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八十三，頁2792。

<sup>128</sup>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頁2048。

<sup>129</sup> 《南史·陰鏗傳》，卷六十四，頁1556。

<sup>130</sup>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頁2451。

<sup>131</sup> 見《陳書·陰鏗傳》。參〔隋〕姚察，〔唐〕姚思廉、魏徵合撰：《陳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三十四，頁472。

隨蕭繹至江州任事。<sup>132</sup>湘東王對荊州舊情難忘，<sup>133</sup>陰鏗則巧妙地利用荆、江的距離感，寫出「風煙望似接，川路恨成遙」的兩地情懷，成了後來唐人異地遙望的典型。<sup>134</sup>同和之作還有朱超〈奉和登百花亭懷荆楚詩〉，<sup>135</sup>除可見湘東王文學集團「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sup>136</sup>的貴遊活動外，亦可由蕭繹對荊州的態度，了解到六朝文士在荆、江之間的行旅失落。所以當蕭繹重回荊州時，即展現出欲建設荊州為陪都之企圖：「闕里尚撓謙，屬鄉裁知足。咨余再分陝，少思宜寡欲。霞出浦流紅，苔生岸泉綠。方知江漢士，變為鄒魯俗。」<sup>137</sup>完全不見其在江州時的惆悵，反而志得意滿地規劃荊州未來的藍圖。

如曾隨蕭偉與蕭續出鎮至江州的何遜，《梁書·文學傳上》謂：

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中衛建安王水曹行參軍，兼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及遷江州，遜猶掌書記。還為安西成王參軍事，兼尚書水部郎，母憂去職。服闋，除仁威廬陵王記室，復隨府江州，未幾卒。<sup>138</sup>

「中衛建安王」即南平王蕭偉，<sup>139</sup>「仁威廬陵王」則是蕭續，<sup>140</sup>而曹道衡認為何遜應該在天監十七年（518）卒於任上，<sup>141</sup>故何遜宦於江州最明確的時間，應該是

<sup>132</sup> 趙以武：《陰鏗與近體詩》（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53。

<sup>133</sup> 同前注，頁88-91

<sup>134</sup> 如王勃（648-675）〈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見〔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冊三，頁676。又如杜甫（712-770）〈秋興八首〉之六：「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見〔清〕仇兆鰲（1638-1717）撰：《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卷十七，冊四，頁1493。

<sup>135</sup>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頁2094-2095。

<sup>136</sup> 見《文心雕龍注釋·明詩》，頁84。

<sup>137</sup>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頁2040。

<sup>138</sup> 《梁書》，卷四十九，頁693。

<sup>139</sup> 《梁書·蕭偉傳》：「九年，遷護軍、石頭戍軍事，侍中、將軍、鼓吹如故。其年，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鼓吹如故。」同前注，卷三十二，頁347。

<sup>140</sup> 《梁書·蕭續傳》：「天監十六年，為都督江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江州刺史。……大同元年，為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同前注，頁342-343。

<sup>141</sup> 參曹道衡：《中古文學史論集》，頁424-434。



天監九年（510）至十二年（513），以及天監十六年（517）至十七年。從現存何遜詩作觀察，如〈答丘長史詩〉：「宿昔敦遠遊，名分乃異路。千里泝波潮，一朝披雲霧。……宴年時未幾，離歌倏成賦。伊我念幽關，夫君思贊務。」<sup>142</sup>前四句道盡分道揚鑣的離情思念，而「千里泝波潮，一朝披雲霧」的意境與蕭繹「極目纔千里，何由望楚津」類似，則可見南朝文士在遠離荆、揚時所皆懷有的失落。後四句則為感懷昔日讌樂，彷彿昨日歷歷，在在顯示出何遜對於行旅的宦遊歷程實含有相當深沉的悲哀，故在其他作品中亦出現此心境之描寫，如〈入西塞示南府同僚詩〉：「伊余本羈客，重睽復心賞。望鄉雖一路，懷歸成二想。」<sup>143</sup>或〈道中贈桓司馬季珪詩〉：「本願申羈旅，何言異翔集。君渡北江時，詎今南浦泣。」<sup>144</sup>還是〈南還道中送贈劉諮議別詩〉：「一官從府役，五稔去京華。遽逐春流返，歸帆得望家。」<sup>145</sup>皆流露出行旅異地而懷鄉情深之意，而與司馬季珪的感同身受，加上何遜自言從府行役而離京五年，可見在「州府雙軌制」下，流轉各地是南朝文士共同的宿命。而一方面何遜寒門家世的背景，造成其：「顧余晚脫略。懷抱日湮淪。游宦疲年事。來往厭江濱。十載猶先職。一官乃任真。土牛竟不進。芻狗空重陳。羈旅無儔匹。形影自相親。」<sup>146</sup>另一方面江州畢竟遠離政治核心荆、揚二地，故即使仍偶有文彥聚會，卻頗有苦中作樂之勉強，又悲從中來的失落，如〈日夕望江山贈魚司馬詩〉：

湓城帶湓水，湓水縈如帶。日夕望高城，耿耿青雲外。城中多宴賞，絲竹常繁會。管聲已流悅，絃聲復淒切。歌黛慘如愁，舞腰凝欲絕。仲秋黃葉下，長風正騷屑。早雁出雲歸，故燕辭檐別。晝悲在異縣，夜夢還洛汭。洛汭何悠悠，起望登西樓。的的帆向浦，團團月映洲。誰能一羽化，輕舉逐飛浮。<sup>147</sup>

「湓城」據《南齊書·州郡志上》曰：「庾亮領刺史，都督六州，云以荆、江為本，

<sup>142</sup>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頁 1683。

<sup>143</sup> 同前注，頁 1682。

<sup>144</sup> 同前注，頁 1683-1684。

<sup>145</sup> 同前注，頁 1687。

<sup>146</sup> 同前注，頁 1685-1686

<sup>147</sup> 同前注，頁 1683。

校二州戶口，雖相去機事，實覺過半，江州實為根本。臨終表江州宜治尋陽，以州督豫州新蔡、西陽二郡，治湓城，接近東江諸郡，往來便易。」<sup>148</sup>可見自東晉以來「湓城」即為江州兼管之處，而到梁朝則為江州重要戰略要地，<sup>149</sup>此詩應作於何遜首次出仕江州之時，「魚司馬」即魚弘，<sup>150</sup>詩自「城中多宴賞」以下描述江州府中的文學活動，沒想到其氣氛之哀傷令人咋舌，絃聲淒切、歌黛慘澹、舞蹈亦非輕快，再搭配仲秋落葉，微涼秋風，引導出何遜內心真正的酸楚：「晝悲在異縣，夜夢還洛汭。」顯然何遜不僅無法認同江州，反而藉「洛汭」之大漢圖騰透露其朝暮思歸於建康的心願。<sup>151</sup>不過「擾擾從役倦，屑屑身世微」<sup>152</sup>的背景，使得回京為可遇不可求的奢望，故詩末何遜藉團月而興昇仙之想，不僅可視為文士不遇之悲的寄託，又何嘗不是受到江州地區仙話靈說及棲遁文化之影響，也可看出文士即使在宴樂唱和之際，江州的氣氛和主題往往與荆、揚等核心區域產生不小的落差。是以其〈從鎮江州與遊故別詩〉曰：

歷稔共追隨，一旦辭羣匹。復如東注水，未有西歸日。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相悲各罷酒，何時同促膝。<sup>153</sup>

逸欽立引《詩紀》作臨行與故遊夜別，<sup>154</sup>詩中不但道出隨府主奔波之狀，更以「東注水」、「西歸日」的空間對比刻劃出文人行旅之流動感，而詩末也流露與故舊離別之淒，暗地憾念昔日南皮之樂。同樣是夜別，在江州時的情緒則又比自京出發之際更為低落，如〈與沈助教同宿湓口夜別詩〉：「我為潯陽客，弁旦乃西游。君

<sup>148</sup> 《南齊書》，卷十四，頁 260-261。

<sup>149</sup> 《梁書·韋祭傳》：「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祭，祭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直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祭。」見《梁書》，卷四十三，頁 606。

<sup>150</sup> 《梁書·魚弘傳》謂其：「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為軍鋒，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遷為平西湘東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卒官。」同前注，卷二十八，頁 422。

<sup>151</sup> 參拙著：《南朝邊塞詩新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 年），頁 84-86。

<sup>152</sup>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頁 1685。

<sup>153</sup> 同前注，頁 1702。

<sup>154</sup> 同前注。

隨春水駛，雞鳴亦動舟。共泛溢之浦，旅泊次城樓。華燭已消半，更人數唱籌。行人從此別，去去不淹留。」<sup>155</sup>「沈助教」雖未詳何人，但何遜既自言「潯陽客」，則此詩作於江州甚為明確，而「弁旦乃西游」似乎表示何遜即將隨府主再次移鎮，沈助教也「君隨春水駛」似欲東下建康，從這隱微的方向對比可知，何遜所表達的幕客流離之慨，也隱含離京自傷之嘆。

因此，南朝無論府僚來到江州，總帶著行旅之惆悵與異域之陌生，在「州府雙軌制」的結構下，一連串宦歷的流轉過程，一方面對於文人來說正符合「述職邦邑」的行旅定義：

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賦，或欣在觀國，或怵在斥徙，或述職邦邑，或羈役戎陣。事由於外，興不自己，雖高才可推，求懷未愜。今量分告退，反身草澤，經塗履運，用感其心。<sup>156</sup>

謝靈運認為文士行旅影響而產生「興不自己」的咨嗟，成為詩人接觸「山水」的一種方式與途徑，<sup>157</sup>故如宋孝武帝（453-464）〈之江州〉：「山曲蒙幽雨。江路結流寒。」<sup>158</sup>可見其客途抒懷之迹。考其於元嘉二十八年（451）擔任江州刺史，<sup>159</sup>故此殘詩應為赴任途中所作，雖已無法確知其中所欲表達的情緒，但「蒙幽雨」、「結流寒」的形容，卻頗有蒼涼淒冷的氣氛。而謝朓之〈至潯陽詩〉：「過客無留軫，馳暉有奔箭。」<sup>160</sup>更顯露出江州處在交通樞紐，而積聚著四方過客的鄉愁離騷。又如鮑照年少之作〈登大雷岸與妹書〉：「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無邊，險徑遊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sup>161</sup>或晚年上荆道中的〈游思賦〉：「捨堂宇之密親，

<sup>155</sup> 同前注，頁 1688。

<sup>156</sup> 謝靈運：〈歸塗賦·序〉。見《謝靈運集校注》，頁 431。

<sup>157</sup> 拙著：〈謝靈運詩中「遊覽」與「行旅」之區分〉中曾對昭明太子（501-531）的「行旅」意義作出界定：「凡是新職上任途中或去職之作皆為行旅。」參《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頁 9。

<sup>158</sup>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宋》，頁 1224。

<sup>159</sup> 《宋書》，卷六，頁 110。

<sup>160</sup> 《謝宣城集校注》，頁 422-423。

<sup>161</sup> 《鮑參軍集注》，頁 83。

坐江潭而為客。」<sup>162</sup>在在皆顯示出相較於政經中心的荆、揚二地，江州文學總多著一分行旅役苦與悲士不遇的慨歎。此外則在面對異鄉陌生山水時，文士必然見獵心喜地飽覽與刻畫，就如同晉室剛剛南渡時，在濃厚的國破家亡之悲下，仍有訝於南方朦朧多變的奇山異水的心態，<sup>163</sup>而這也一樣出現在不停流轉各地的幕府僚佐之間。如鮑照對大雷岸奇景怪水、珍物異獸的驚異之辭；<sup>164</sup>或是何遜在荊州〈渡連圻〉時的驚心動魄，<sup>165</sup>在在皆顯示出文人拜「州府雙軌制」之賜，得以親身經歷各地物色，進而「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即）字而知時也。」<sup>166</sup>開創南朝山水詩的高峰。

然若相對為返都之作，則情緒明顯輕快許多，如謝莊〈自潯陽至都集道里名為詩〉也顯示出文人述職異鄉時的流動感：

山經亟旋覽，水牒勑數尋。稽榭誠淹留，煙臺信遐臨。翔州凝寒氣，秋浦結清陰。眇眇高湖曠，遙遙南陵深。青溪如委黛，黃沙似舒金。觀道雷池側，訪德茅堂陰。魯顯闕微跡，秦良滅芳音。訊遠博望崖，採賦梁山岑。崇館非陳宇，茂苑豈舊林。<sup>167</sup>

雖今日已無法俱考各句地名，然「南陵」、「青溪」、「雷池」、「梁山」等則仍可判斷所在江州；「稽」應指會稽，則此詩應該是謝莊在揚州與江州間川流舟行時所作。但此詩畢竟處在返都情緒，使其反倒毫無流轉漂泊的惆悵之嘆。又如劉峻〈自江州還入石頭詩〉：「鼓枻浮大川，延睇洛城觀。洛城何鬱鬱，杳與雲霄半。前望蒼龍門，斜瞻白鶴館。槐垂御溝道，柳綴金隄岸。迅馬晨風趨，輕輿流水散。高歌

<sup>162</sup> 同前注，頁 1。

<sup>163</sup> 如郭璞（276-324）的〈江賦〉對長江的描寫，實足以代表北來士人對異域他鄉的觀感：「爾乃域之以盤巖，豁之以洞壑，疏之以洿汜，鼓之以朝夕。川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珍怪之所化產，瑰奇之所窟宅。……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參〔南朝梁〕蕭統（501-531）編，〔唐〕李善（?-689）注，〔清〕胡克家（1757-1816）考異：《文選》（臺北：華正書局，2000年），卷十二，頁 189。

<sup>164</sup> 《鮑參軍集注》，頁 84-85。

<sup>165</sup>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頁 1689。

<sup>166</sup> 《文心雕龍注釋·物色》，頁 846。

<sup>167</sup>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宋》，頁 1252。

梁塵下，<sup>168</sup>瑟荆禽亂。我思江海遊，曾無朝市玩。忽寄靈臺宿，空軫及關歎。仲子入南楚，伯鸞出東漢。何能栖樹枝，取斃王孫彈。」<sup>168</sup>劉峻以疾辭去安城王的戶曹參軍，自荊州返回建康，故詩中透露的情緒已非行旅之悲苦，而是對建康城生活的構想藍圖。由此可見，江州處在荆、揚之間，成為南朝文士流蕩東西的中繼站，江州以其本身奇特的風景物色，接納著來自各地的文士附庸，卻營造出漂泊無依的行旅哀愁。

## 五、結論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

自古名山大澤，秩祀所先，但以表望封圻，未開品題名勝，逮典午而後，遊迹始盛，六朝文士無不託興登臨。<sup>169</sup>

六朝之所以能夠「遊迹始盛」，不得不把府官系統這項文人四方仕遊的管道考慮在內，山水靈秀之氣，終能自蒼莽洪荒之中進入人文歷史的舞臺。府官僚佐因不限籍貫，故造成文人有機會面對異地風物；加以其頻頻隨府主遷鎮，故所寫物色實新鮮可喜，景觀變動的幅度也大，各地山水也因此得以獲得文人的品題。是以，文人隨府主出鎮，不僅幫助京師文化的向外傳播，<sup>170</sup>也的確帶給南朝方興未艾的山水詩注入新的生命。

本文即立足於南朝此一特殊制度：「州府雙軌制」的立場，觀察南朝時代江州地區的文學發展，發現江州本身有其一脈相承的文學傳統，奇巖窟泉四布的自然景觀，造成仙境傳說的層遞積累，<sup>171</sup>與文人欣慕隱逸的群聚，建構了江州地帶質

<sup>168</sup>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頁 1757。

<sup>169</sup> 見〔清〕永瑤（1743-1790）、紀昀（1724-1805）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地理類四》，武英殿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冊二，卷七十一，頁 531。

<sup>170</sup> 曹道衡：《南朝文學與北朝文學研究》，頁 151。

<sup>171</sup> 《水經注》云：「（宮亭湖）又有孤石，介立大湖中，周迴一里，竦立百丈，轟然高峻，特為瓌異。上生林木，而飛禽罕集，言其上有玉膏可採，所未詳也。」參〔北魏〕酈道元（?-527）注，楊守敬（1839-1914）、熊會貞（1863-1936）疏，段熙仲（1897-1987）

樸平淡的隱逸文風，而慧遠在廬山成立僧團，深化了江州文人對山水與玄理的理論視角，也形成與揚州文人歌詠「東山」之臥的不同脈絡，造成隱逸思想在江州遊仙詩風與揚州公讌風尚間的不同理解。而荊州作為上流重鎮，南朝文人實已視之為陪都，江州作為荊、揚之緩衝，其地位也必然在文人心中低於荊、揚，是故當文人移駐當地或途經此地，皆透露出行旅動盪下的漂泊無依，以及悲士不遇的身世之感。因此，由以上研究可知，江州不僅在南朝政治史上有著緩衝上下游的作用，在文士心中，實也擺蕩在仕與隱、遇不遇、中心與邊緣的意象之間。

## 引用文獻

- 丁福林：《鮑照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 于浴賢：〈六朝紀行賦繁榮之鳥瞰〉，收錄於南京大學中文系主編：《辭賦文學論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386-402。
- 王象之：《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 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年。
- 王文進：《荆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1987年。
- \_\_\_\_\_：《南朝邊塞詩新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
- \_\_\_\_\_：《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
- 王仲榮：《魏晉南北朝史》，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
- 王永平：〈論謝安之家教〉，《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1卷第2期，2008年4月，頁1-11。
- 方東樹著，汪紹楹校點：《昭昧詹言》，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
- 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
- 仇兆鰲：《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永瑤、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武英殿本）。
- 司馬光撰，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點校本）。
- 田餘慶：〈古史分合中的國土開發與民族發育〉，收錄於「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年，頁82-83。
- \_\_\_\_\_：《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 朱大渭：《六朝史論》，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點校本）。
- \_\_\_\_\_：《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點校本）。
- 李劍峰：《陶淵明及其詩文淵源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
- 沈約撰：《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點校本）。
-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 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點校本）。

- 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 胡大雷：《中古文學集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
- 胡之驥註，李長路、趙威點校：《江文通集彙註》，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胡阿祥：《六朝疆域與政治》，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
- \_\_\_\_\_：《魏晉本土文學地理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 姚察、姚思廉、魏徵合撰：《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點校本）。
- \_\_\_\_\_：《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點校本）。
-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點校本）。
- 徐公持：《魏晉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
- 徐效綱：《廬山典籍史》，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1年。
- 陳明：《中古士族現象研究——儒學的歷史文化功能初探》，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八，頁22（影印臺北故宮藏本）。
- 曹道衡：《中古文學史論文集續編》，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 \_\_\_\_\_：《中古文學史論文集》，臺北：洪葉出版社，1996年。
- \_\_\_\_\_：《南朝文學與北朝文學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 \_\_\_\_\_：《蘭陵蕭氏與南朝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曹融南校注集說：《謝宣城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張承宗：〈六朝時期江州的戰略地位〉，《蘇州大學學報》1993年第1期，頁88-95。
-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章義和：《地域集團與南朝政治》，上海：華東師範出版社，2002年。
- 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傅樂成：《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 趙以武：《陰鏗與近體詩》，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 蔡日新：《陶淵明》，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0年。
- 劉苑如：〈廬山慧遠的兩個面向〉，《漢學研究》第24卷第1期（2006年6月），頁71-106。
- 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余淑宜整理：《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93年。
- 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98年。
- 劉緯毅輯：《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



- 衛宏撰：《漢舊儀》，收入《百部叢書集成》影印《三代遺書》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
- 鄭毓瑜：《六朝情境美學綜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年。
- \_\_\_\_\_：《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
- 錢仲聯增補集說校：《鮑參軍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錢志熙：《魏晉詩歌藝術原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 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點校本）。
- 蕭統編、李善注、胡克家考異：《文選》，臺北：華正書局，2000年。
- 蕭繹：《金樓子》，臺北：世界書局，1975年（四部刊要本）。
- 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點校本。
- 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縮印本）。
-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年。
- \_\_\_\_\_：《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年。
- 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
- 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本：《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

# A Stud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Jiangzhou District and Poet Laureate of Southern Sovereignty

Wang, Wea-chiu \*

## [ Abstract ]

Most scholars, who major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will advert to “rivalry between Jingzhou and Yangzhou district” affecting political situation of southern sovereignty. Furthermore for advanced researching, Jingzhou and Yangzhou district the constant authority of southern sovereignty, but actually Jiangzhou district is the axis. Latterly, experts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ssume an approach “ district analysis” to interpret the culture of southern sovereignty, and gradually accent on the literature study of “ Jiangzhou district ”. However, before twenty years, I have deliberated upon “Stud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Jingzhou-Yong zhou district and poet laureate of southern sovereignty” extending the study of district culture, and took an concept “Dual track of province and prefecture” contacting with district essential of southern sovereignty to explore the marvelous change of development of poet laureate of southern sovereignty.

Now, I glean performance from most researchers and retake “Jiangzhou literature” as an argument to debate its specific status between Jingzhou and Yangzhou district. I, firstly, inspect these Jiangzhou dominion commanders, and their staff assistants, at Dongjin, Song, Qi, Liang, and Chen periods, for drawing cultural phenomenon and synthesizing important works about scenery with hills and waters of Jiangzhou, secondly, compare diversities among Jingzhou, Yangzhou and Jiangzhou districts, and through this research, I believe, could find ou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ity and midst culture at southern sovereignty.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Dong Haw University.

Additionally, Jiangzhou literature, how to keep pabulum poetry and hermitage quality, is in culture clash and pendulous situation between Jingzhou and Yangzhou districts ; under the power construction of “Dual track of province and prefecture”, not only promotes dominion commanders and their staff could confront Jiangzhou district, but also includes writing purposes and subjects of these writers of local and outer districts, moreover, illustrate religion value and spiritual totem of paradise of literati in the Jiangzhou district by spiritual allegory “Mountain Lu” at southern sovereignty.

**Keywords:** Jiang zhou, Yang zhou, Jing zhou, rivalry between Jingzhou and Yangzhou district, Mountain Lu, hills and Waters, district research, the collateral system of zhou fu,hermitage.

